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PAYOFFS

# 企业家精神

在本书中，鲍莫尔研究了“企业家”这一生产要素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行为之间的配置，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要制定与企业家才能有关的合理政策，关键在于要找到那些可以阻止或防止企业家才能被用于非生产性用途的各种措施，激励人们更好地运用“企业家资源”。

[美]威廉·鲍莫尔 著  
孙智君等 译 郭熙保等 校译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 企业家精神

[美] 威廉·鲍莫尔 著  
孙智君等译  
郭熙保等校译

武汉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企业家精神/(美)威廉·鲍莫尔著;孙智君等译;郭熙保等校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

ISBN 978-7-307-07358-6

I. 企… II. ①鲍… ②孙…[等] ③郭…[等] III. 企业领导学—研究 IV. F27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974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7-2010-24号

© 1993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is transl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and the Structure of Payoffs* written by William J. Baumol in English by The MIT Press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威廉·J. 鲍莫尔所著《企业家精神》一书原版以英文在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译本经由博达版权代理公司授权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印或抄袭本书内容。

责任编辑:柴艺 夏敏玲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9.75 字数:278千字 插页:1

版次: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7358-6/F·1317      定价:29.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献给 哈罗德·普莱斯——

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绅士和朋友

要解释并预言创新行为和企业家的供给是一件众所周知的难事，但是，威廉·鲍莫尔认为，由于企业家精神通常不被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之中，经济学家显然忽略了这个可能对经济增长做出了关键贡献的因素。在本书中，鲍莫尔试图重新把企业家精神纳入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特别地，他研究了“企业家”这一生产要素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行为之间的配置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传统观点认为，模仿减少了创新收益，从而阻碍了技术进步。与这种观点相反，鲍莫尔认为，企业家将在整个市场上起到传播和加速采用新技术和新创意的作用。企业家通过不断地试图偏离公众认识的做法，给经济活动带来各种变化，从而防止其陷入墨守成规之中。通常，这些变化能够改善效率、增加生产并刺激经济增长。

当然，鲍莫尔也指出，尽管企业家的所作所为通常是有益于经济发展的，但并不总是如此。他在本书中用了若干章的篇幅来说明各种类型的企业家精神的不恰当运用，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的许多并购活动，以及诸多琐碎的诉讼行为——这些都是企业家试图增加蛋糕的分配份额而不是做大蛋糕的例子。因此，鲍莫尔认为，激励人们更好地运用“企业家资源”，对于保持一个自由企业制度社会的活力至关重要。进一步地，他还提出了进行相关经济制度变迁以实现这一目标的建议。

威廉·鲍莫尔是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该校 C. V. Starr 应用经济学中心主任。

鲍莫尔将丰富多彩的企业家中心舞台搬到了对创新和增长的研究之中。本书巧妙地把经济史和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对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并购浪潮到南北技术转移等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探讨。鲍莫尔的文章读起来永远是那么令人心悦诚服。

——大卫·多拉 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

这本由鲍莫尔教授撰写的动人的图书，在内容和技巧上——从经济思想史到动态均衡分析——都显示出了其渊博性。也许本书中最具有煽动性的话题是：它认为美国的商业游戏规则已经变得更加有利于企业家的寻租行为，而不是生产性努力。本书极有可能挑起对美国商业结构的重大公共讨论。

爱德华·N. 沃尔夫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 中文版自序

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以及最早的创新思想发源地，拙作能在这个国家翻译出版是我的殊荣。正如将在下面指出的，因为我个人与中国的关系，我对此感到尤为高兴。另外，作为回报，我希望本书的内容为中国读者提供价值。“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思想的交流过程带来的报酬是超加性的：总体大于各部分之和。的确，正因为这一信仰，我当前主要致力于研究一部不平凡的、不断吸取经验教训和加以认识的中国发明史。

尤为特别的是，历史显示，中国与其自身创造的、不可思议的、大规模的发明历史十分不相称。但是，产生于西方的补充性技术却显示了一种将这些发明应用于高效率工作的能力。我们创造了一种致力于这项工作的特殊职业——企业家。正是企业家，能真正认识到何种发明对社会、个体使用者以及经济增长的贡献最有潜力；正是他们，能洞悉如何更好地修正与完善那些发明；也正是他们，将这些发明引向市场，并确保其被用于有着最高使用效率的地方，即使那些地方并不涉及利润和资金。

我们在这一领域已经有大量认知，这将有助于鼓励企业家的工作，促进这项任务的实施。这与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知识积累，进而促进发明者和发现者的工作是相呼应的。我们所缺少的知识在于，如何更好地创造和训练这两类人，即发明新项目的发明者和将其引入生产过程的企业家。但令人奇怪的是，这类课程的教学仍然主要沿用传统的教学体系，而缺乏系统的教学模式的验证。作为获得这类必备知识的关键一步，我们正在进行一项主要由中、美两国大学合作完成的研究方案。

之所以提及这项研究，是因为我的书试图为之以及其他相关研究提供部分依据。它承担着考察企业家完成什么工作、他们是如何实施的等事宜，也承担着调查企业家工作的激励机制属性等事宜。我希望这项研究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都是极为有利的。我相信这类研究将使我们成为更为有效（和更友好）的竞争者。也希望读者们能从本书的内容和其他该领域作者提供的有价值的材料中得出结论：互利才是一个合理的前景。

最后，我想从个人的角度说：当我说你们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时，在很大程度上极易引人误解，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我属于这两块土地。我有一些关系密切的中国朋友，在我的家庭中也有具有中国血统的亲人。就这一意义而言，如果允许的话，我愿意将本书献给他们。最后，我要向本书的翻译者，辛苦的劳动者，致以深深的谢意，我希望，它能将我们的心拉得更近。

威廉·鲍莫尔 于纽约

2008年9月

## 自序

半个多世纪以前，当我开始对经济学感兴趣时，我就被企业家深深吸引。毫无疑问，企业家是资本主义机制所产生的一个英雄形象。市场带给我们的并非仅仅是遍地的小商人，它也培养了不少具有传奇色彩的舞台人物，他们中的许多人尽管并不总是道德楷模，但是却显然从事着高度造福于社会的事业。不过，缺少反面角色的故事往往难以抓住人们的眼球。的确，在商业舞台的表演者中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充满魄力的冒险家们，Goulds、Fisks、Drews 和 Vanderbilts，有关他们的故事我百读不厌，因为这些故事情节是任何一个小说家所无法构思出来的。有人说弥尔顿所塑造的魔鬼——《失乐园》中的主角——就是这样一个真正令我们倾心的人物。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那些有胆量的冒险者在我的心目中占据的便是这样的位置。

但是，如果说既有道德败坏的企业家，也有品质高尚的企业家——他们无一不是经济增长故事中的主角——为什么在经济理论中很少提及后者，而对于前者事实上完全避而不谈？50 多年来，这个谜一直潜伏在我的下意识中，尽管偶尔我也会把它写到有关企业家精神的某个注解里。终于，是到了揭开这个谜团真相的时候了。本书正是关于该问题的研究成果。

本书的主题是“企业家”。作为一项可配置的资源，正如那些缺乏生气的投入一样，它的配置也是由价格机制——对企业家所从事的不同行为给予的经济报酬结构——所决定的。我的基本假设是，企业家的善行与恶行，或者说不带一点感情色彩，在生产性行为和非生产性行为之间的配置结果，对于经济增长绩效是极为重要

的，它绝不是对于经济无足轻重的偶然事件。报酬结构也会影响到企业家在占用其时间的不同生产性行为之间的配置，即在创新行为和扩散新技术行为之间的配置，事实上，后者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

该主题似乎一直促使我写一本结构多少有点松散的书，而不是那种具有刻板逻辑的线性叙述体书。另外，这一主题也不允许方法上的统一性。我自己感觉可运用的方法是，既要有点数学，也要有点历史，当然，这种感觉所导致的后果便是随后的各章内容从方法、主题和可读性方面来看都存在不少的差异。

由于我自知作为历史学家和博弈理论专家还差得很远，所以，我要感谢的名单将非常长，尤其是在上述这两个领域。内森·罗森伯格所做的远远超过了其职责的要求，他逐章地对手稿进行了润色，而且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我要深表谢意的历史学家包括 Stefano Fenoaltea、Joel Mokyr、Moses Abramovitz、Paul David、Lawrence Stone、Constance Berman、Claudia Goldin、William Jordan 和 Theodore Rabb。有关博弈论方面的帮助则主要来自 Dilip Abreu、Zsuzsanna Fluck 和 Maria Luisa Petit。Coudert 兄弟律师事务所的 Jonathan M. Jacobson 在有关滥用反垄断措施对付破坏竞争行为问题上，尤其是在一系列相关案例的编撰方面提供了帮助。IBM 公司的 Howard G. Figueroa 和 United Technologies 的 W. D. Lewis 极为慷慨地提供了有关企业间技术转移方面的有价值信息，与 Eastman Kodak 公司董事长 Colby H. Chandler、Gallo Vineyards 公司的 Ernest Gallo 以及其他工业界人士的会谈则为本书补充了大量资料。安德烈·施莱弗和我的合作者爱德华·沃尔夫也都仔细审阅了大部分文稿并贡献了他们的巨大智慧。与 Louis Lowenstein 讨论收购问题使我受益匪浅，Janusz Ordover 则提供了企业间技术共享方面的材料。我还要感谢 Barbara Blumenthal、Partha Dasgupta、Avinash Dixit、Ralph Gomory 和 Burt Malkiel 所给予的富有价值的评论和建议。很明显，我不可能指望一个比这更好的智囊团了。

本研究在不同时期分别得到了 Price 企业家研究所、Alfred P. Sloan 基金会、国家科学基金会信息科学与技术部以及纽约大学 C.

V. Starr 应用经济学中心的慷慨资助。我对它们深表谢忱。

最后，我要对我的几位同事表达我最大的感激之心。一直以来，至少在我们漫长而令人愉快的合作过程中，Sue Anne Batey Blackman 从事着对发明家活动及本书中其他重要内容的研究工作，在我语言使用欠妥时，他总是提醒并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找不到第二个像他这样的人了。在本书的前期工作阶段，Vacharee Devakula 全身心地参与了研究并制作图表，遗憾的是她中途要离开我回到泰国去。本书的后期工作得到了 Janeece Roderick 尽心尽力的相助，她继续和我一起完成本书，为这一精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于波多黎各，卢奎约海滩

1993 年 1 月

# 目 录

中文版自序·····	1
自序·····	3
第1章 经济学中的企业家·····	1
第2章 企业家精神：生产性、非生产性和破坏性·····	28
第3章 企业寻租：公司收购案例·····	56
第4章 进取性诉讼与陷入诉讼的企业家·····	82
第5章 创新努力与进取性破坏·····	111
第6章 常规化的创新及其对利润的抑制效应·····	127
第7章 创新和模仿的最优时间选择模型·····	149
第8章 技术转移丰厚的共同收益：传播与市场机制·····	172
第9章 技术转移机制 I：富有企业家精神的模仿者·····	192
第10章 技术转移机制 II：互补性创新中的技术公会·····	207
第11章 技术转移的效率与定价·····	237
第12章 改进企业家精神配置的规则与政策·····	254
结语：增长模型中的企业家·····	273
参考文献·····	285
译者后记·····	300

# 第 1 章

## 经济学中的企业家

……他是……非凡的企业家，具有承担这一角色必备的所有品质：勇气、毅力、精力充沛、煽动性、诡计多端、富于想象力。

——麦库罗 (McCullough, 1977, p. 53)

对费迪南德·德·雷赛的描述

这是一个商业定理，除非是在他有长远战略目标需要实现的情况下，否则，那些大亨们从不关心他的交易行为在产业系统内所导致的骚动对整个系统到底是好是坏。

——凡伯伦 (Veblen, 1904, pp. 29-30)

本书的目的是要设法复兴企业家—领导理论，是要为恢复研究个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指明出路。简言之，本书试图在我曾经称之为“宏伟动态理论” (magnificent dynamics) 的领域有所建树。在该领域，企业家的地位被广泛承认并且普遍接受。人们常说，企业家的生产性贡献是创新。但是，本书中将要说明的是，这可能低估，也可能高估了他（她）的作用。

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企业家常常根本没有任何生产性贡献，而且，有时还由于从事了凡伯伦所描绘的对生产的“系统性破坏”，从而扮演着破坏性角色。这种情形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只要经济中的报酬结构如下：寻租类（以及更糟糕的）非生产性行为的收益高过生产性行为——它就会发生。

事情的另一面是，“创新”一词并没有对生产性企业家在技术

进步和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予以充分的估计。技术进步至少有两类，其中有一类往往为经济学文献所忽略。它不但取决于潜在新创意涌现的速度，而且也取决于这些创意通过现实世界的生产性行为而被扩散和采用的速度。只要产品被差异化（这正是绝大部分“高技术”活动的实质），或者只要商品在本地生产和消费，就会有许多采用不同技术和不同产品规格的企业来提供商品。如果众多的生产者中只有一家运用了有价值的创新，很明显，这给生产力带来的好处要远远少于该创新被广泛采用所带来的好处。因此，新技术传播的速度越快，它对生产力的贡献越大，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是，该命题不那么明显的地方是两个相关的观测判断，对之我们后面还要深入探讨：第一，我们将给出理由说明，尽管这并不为奇，扩散速度在创新促进生产力提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完全比得上创新本身的速度所发挥的作用；第二，后面将说明，新创意的扩散速度并不是被随意决定的，而是深深地受到市场力量的作用，而这些市场力量正是通过企业家来发挥作用的。的确，企业家在创新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书将用若干章来阐述技术的传播以及企业家在此过程中的作用。

## 1.1 不同的角色：企业家和管理者

在构成经济分析的内容要素中，企业家一定是各种角色中最有吸引力的，而且是最难以理解的一个了。企业家很久以来就被公认处在决定企业具体行为的科层体系的最高点，因此，被赋予了保持自由企业社会活力的重大责任。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这一重要角色尽管经常出现，但是却很模糊，缺乏清晰界定的形象和功​​能。在正式理论文献中，至少直到最近，只有约瑟夫·熊彼特，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弗兰克·奈特，成功地给这个角色注入了生命，并且赋予了他（她）一个特定的、其大小足以配得上他（她）所被承认的重要性的活动空间。但是一旦这样做，他们便不得不牺牲分析上的便捷性甚至大量的数理描述。近几年来，尽管经济现实一再强调企业家的重要性，但是，事实上它却从理论文献中消失了。而

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尽管一些近期理论著作似乎第一次给企业家行为分析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空间，但是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一点上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质性改善。

本章重点关注三个问题。第一，简单地评述企业家精神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各种原因。第二，试图解释为什么经济理论未能对企业家决策过程提供有启发性的正式分析，并且断定未来它也无法做到这一点。第三，将提出一些方法，以便在理论上能够对企业家精神问题发表更加贴切的观点，即使它不能对企业家行为和企业家能力提供严格分析。

不过，在展开讨论之前，建议有必要从语义上做点区别，这种区别虽是人为的，但是仍然很重要。区分企业家功能和管理者功能对于我们的论题将是有利的，尽管熊彼特强调过，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可能从这类行为转变到另一类行为上（1936, p. 78）。我们把管理者界定为这样的个体，即他（她）负责检查连续生产过程的当前效率。管理者的任务是：关注可行的生产过程是否能够和技术进行合理组合，既满足于当前的产出水平，又适合预期产出水平。管理者负责的事情包括：节约成本、制定满足合同要求的计划、日常的定价和广告开支决策、不涉及发生新程序的简单增产过程，等等。总而言之，管理者主管那些包含在企业习惯模式中的行为和决策。

上述表述并非要贬低管理行为的重要性，或是暗示它没有多少困难。哈维·列宾斯坦和卡尔·凯森等人认为，实际上大部分企业未能实现最高效率——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它们处在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内的位置上——因此，它们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便是设法尽可能地接近这一边界。也就是说，即便在已知的技术和熟悉的业务界限范围内，也要提高其效率。这大概是管理者的部分工作，他们要经常地寻找办法来在这里节约一点，在那里多挤出一点。尽管标准的理论模型通常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即企业家能够做出最优的——因此也是最有效率的——实现其目标的决策，但是许多模型似乎都只是提供了一个对管理者功能有用的、分析起来简便易行的描述。一旦知道了某种安排，或者说，从测算、经验和判断上看都显示构成了接近当前最优的某事物，管理者一定会发现，这一安排实际上是建立在合理的近似程度之上的。

企业家（不管是否身兼管理者身份）则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她）的工作是找到新思想并将它们付诸实施。他（她）要承担领导、有时甚至是动员的工作。他（她）不能允许事情变得墨守成规，对他（她）而言，今天的业务绝不是明天最好的。总之，他（她）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者。他（她）是行使着商业文献中称之为具有“领导力”的个体。正是他（她），事实上在被人们所接受的企业理论中却没有一席之地。

## 1.2 企业家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想要解释特莱格维·哈维尔默（Trygve Haavelmo）所描写的“经济现实中真正巨大的差异”，就必须关注企业家精神。因为真正巨大的差异通常是长期以来历史发展的写照，或者说，是不同经济体——尤其是那些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经济体——比较状态的写照。这些差异包括各种对比性的变化，比如像日本这样的一些经济体得到了飞速发展，而有的国家则失去了它们的领导地位，还有另外一些经济体则是前景未卜，其未来的相对地位似乎还悬而未定。

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企业家功能是产量和生产率增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成分。最近的经验证据和现实教训都证明了这一观点。例如，许多对生产函数特性的经验研究都表明，纯粹的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扩张很大程度上不能对各国历史上的产量增长给出解释。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索洛（Solow, 1957, p. 320）依据 1909—1949 年美国的数据得到如下结论：“在此时期内（美国的）人均小时总产量翻了一番，其中 87.5% 是由于技术进步，只有剩下的 12.5% 来自资本使用的增加。”<sup>①</sup> 不过，任何创新，无论是单纯的

---

<sup>①</sup> Jorgenson 和 Griliches（1967）的一篇文章对索洛的数量估算和其他类似的结论提出了挑战。然而，他们的争论并不必然意味着任何对企业家功能的诋毁。Jorgenson 和 Griliches 通过将技术变化作为剩余来处理，以便重新估计其作用的大小，他们通过直接调查单位工人产出的增长中有多少可以由传统方法测算的纯粹投入数量的增加来解释，从而估算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剩余贡献。企业家和创新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常常伴随着投入数量的增（转下页）

技术进步还是工业组织方式的改进，都依赖企业家的首创精神。由此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如果忽视企业家，我们将无法对历史上的经济增长给出完全充分的解释。

很明显，那些关注发展政策的人也是受到了类似结论的影响。如果我们想解释那些获得了显著增长的经济体的成功之处——相比于那些经济仍然相对停滞的经济体，我们就必须要考虑这些国家之间在企业家精神供应和驱动其供应的动力机制上的差异性。为了激励经济发展，那些发展计划的设计者就要把大量的精力用到提供各种培训和支持企业家的手段上。

在许多其他经济领域的关于制度及其应用的讨论中，企业家也占据着显著地位。例如，在人们看来，有时一个衰退产业（想得到复兴）面临各种困难主要是因为缺少企业家；而对国际收支平衡危机的讨论有时也将其归咎于类似的原因。因此，无论是在宏观还是微观经济问题的分析中，企业家都是一个重要角色。不管他（她）是否被赋予主角的位置，他（她）只要出现了，就不会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 1.3 熊彼特模型：简要重述

由于熊彼特模型是一个直接处理我们这里所解释的企业家精神的分析框架，也由于它在本书中将反复出现，所以，对它做一个概括并不显得多余。既然是高度概括，就难免要排除他最初讨论中所

---

（接上页）长，这无疑是真实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家在这类产出增长的过程中作用甚微，或者说没有作用。这仅仅意味着，企业家活动的数量很难量化，因此，这类活动和传统投入数量之间的关联性使得前者的作用格外地难以测算。

此外，Jorgenson、Gollop 和 Fraumeni（1987）最近的一项研究以高度复杂的经济计量分析为基础，即便该研究将美国劳动生产率在“二战”后的显著提高主要归功于资本存量，然而，他们的计算也表明，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中超过 1/3 可以归因于创新（生产力的改善）（pp. 1-2）。